



现代中国何以起源？

——读李怀印《现代中国的形成（1600—1949）》

南宁市第三中学 李杰

2022.5.20



“

“现代中国”
从何时开始
形成？

01

1840年——基于现代化、全球化的叙事。

02

1911年——基于制度变革的叙事。

03

1919或1921年——基于革命和意识形态的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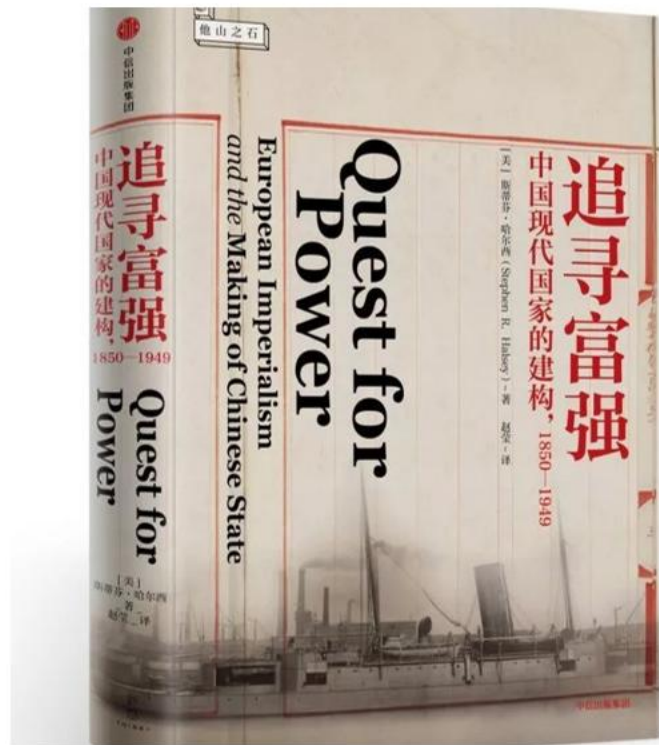


学术史回顾

- 20世纪90年代之前，“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此消彼长。
- 20世纪90年代后，“加州学派”与“新清史”的视角
- 利用跨国史与全球的视角，从长时段的历史研究中对此进行解释，如“加州学派”学者认为中国在1800年以前并不落后于西方，现代中国的成功不过是其过去数千年累积的领先世界经济的再版；
- “新清史”论者认为清朝并不是一个稳定统一的“东方帝国”，其发展过程“并没有与欧洲分道扬镳”，并质疑由此发展而来的现代中国的强大是否能持续下去。

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忽略它就无法理解当下的中国，也难以理解中国如何与世界互动。

哈尔西、费正清、孔飞力、彭慕兰等汉学家试图在全球脉络下向近代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



今天的中国究竟从何而来？现代中国何以能避免多族群帝国崩溃和分裂的命运，建立一个高度有效且长期稳定的国家？其疆域构成、族群组合和政权形态具有何种历史合理性与独特性？今后的中国国家能否继续维持“既大且强”的格局？本书令人信服地回答了以上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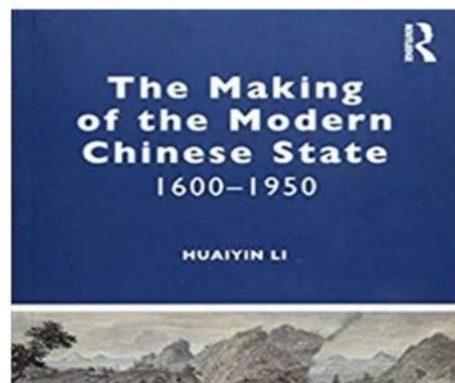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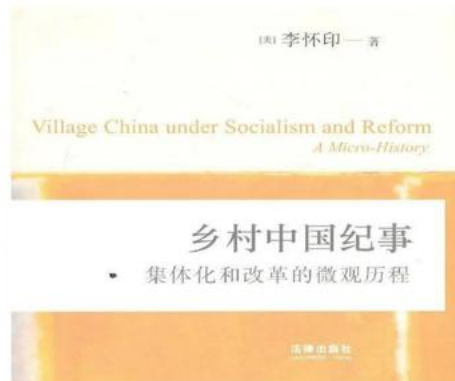
一、本书作者

李怀印，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校区历史系教授。他在中、美学界均浸淫有年，既对中国大陆近代史研究的学术脉络有切身体认，又有身处美国学界的观察视角，可谓兼具局内人与局外人的优势；并尝试以传统与现代化的架构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早在20世纪80年代他已开始酝酿对于中国近代史叙事体系的反思。



李怀印

李怀印的学术 路径：





《重构近代中国：中国历史写作中的想象与真实》第一次系统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历史书写，包括1949年以前现代化史学与革命史学的平行发展和对抗、1950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化以及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末的“激进史学”、19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引进、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史学主叙事危机和史学的“后现代转向”，并深入探讨了主叙事构建背后的复杂原因。



历史写作的真实性完全取决于语境，易变并且多层次，随着不同的历史叙述模式和近代中国历经的不同阶段而改变。在建构叙事时，如果史学家将思想信仰或党治国家的需求置于首位，那么历史表达就可能是不真实的；它也可能是真实的，如果史学家摆脱了政治或个人偏见，使其叙事立足于历史证据。

——李怀印

中国近代史书写受到欧洲中心历史书写的误导体现在三个方面：

- 01 现在讲中国近现代史，一般都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国家和中国交战之后，才有了近代史。这就讲不清楚主权、领土和族群的关系由来。
- 02 不管国内还是国外，实际上都严重受到了西方历史书写中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书写范式的影响。
- 03 写中国近代史很容易被误导的地方，就是把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概念简单照搬。

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就是要过去被误导的地方给纠正过来，把近代中国的疆域、族群关系和主权加以理清。

本书特点鲜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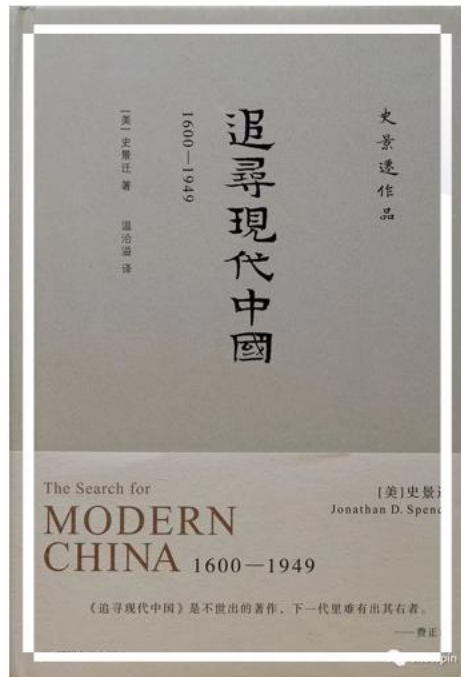


本书特点鲜明

- ◎ **新见迭出：** 本书对影响现代中国形成的地缘政治、族群关系、传统治理等问题的研究，对东亚传统秩序、现代主权国家理论的剖析，对欧洲中心论及革命和现代化叙事方式的反思，均有独到的见解；
- ◎ **研究方法新：** 采用“宏观历史”的研究路径，以综合的视角努力挣脱宏大历史叙事的空疏化与日常历史叙事的碎片化之泥潭，将诸多微观研究升华为宏观考量，建立了一个全新的解析结构；
- ◎ **视野宏大：** 本书从全球史视野出发，将近世中国的国家转型置于世界近代史的视角下加以认识和照察，立足于对中国历史的深层次理解，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中国现代主权国家形成的独特性；
- ◎ **时间跨度长：** 对十七至二十世纪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做了全面论述，打破了国内外中国史学界所习惯的古代与近代、近代与现代之间的分期藩篱，把延续数个世纪的中国国家转型历史作为一个既有不同环节又前后贯通的完整过程；
- ◎ **强烈的现实关怀：** 站在新千年的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重新探求对今日中国历史认识具挑战性的问题，思考当代中国国家发展和转型等深层问题；
- ◎ **史料丰富：** 充分利用大量原始档案、私人回忆以及官方出版物，书中论点皆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和数据图表作为支撑。

试图从中国来理解中国的现代进程：

1. 一个“现代”国家既可融汇一体，又能兼容并蓄，既有明确的自我认同，也能以平等的地位竞逐新市场、新技术、新观念。
2. 从内部因素看，自由劳动孕育了中国的现代进程，它沉重地推动中国社会缓慢、但沿着适合于中国国情的道路及方向前进；
3. 从外部因素看，西方异质文化的影响极大推动并加快了中国的现代进程，其“玩法”几使中国社会脱轨，但中国文化凭借其宽广的覆盖面、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大的包容力，对中国的现代进程总能起到“陀螺仪”一般的纠偏作用。
4. 正是在这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走上了它与众不同、跌宕起伏又波澜壮阔的现代历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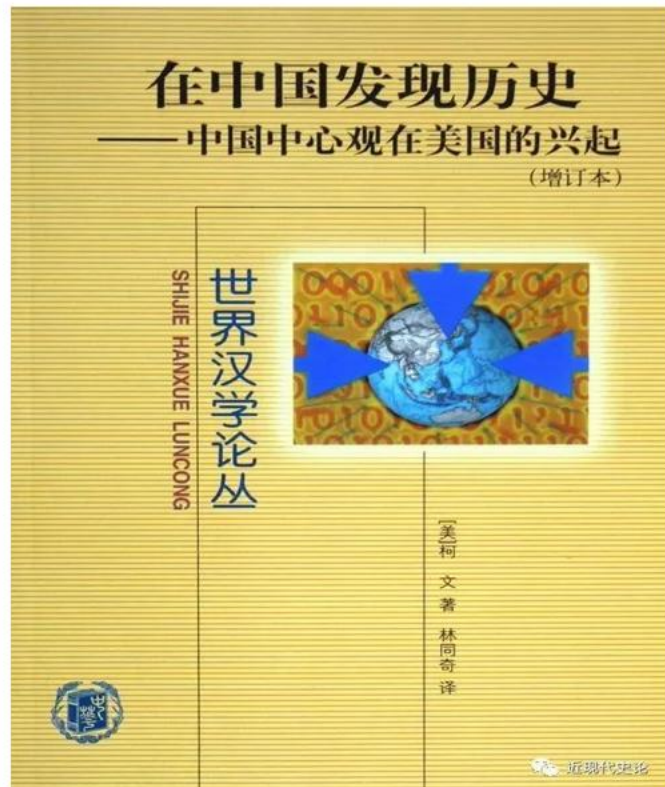
史景迁先生认为，“屈辱”是往前两个世纪“种出的果”。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将人为割裂这种因果关系。反之如果将时间起点定位于16世纪末期，我们不仅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产生“屈辱”的因果关系，也能更好帮助我们“以史为鉴”来解释和处置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些难题。

史景迁先生认识这个时期后半段的屈辱根源于前半段的“傲慢”。因此屈辱的根源从某种角度来看，主要矛盾并不只是19世纪上半页西方文明野蛮的“船坚炮利”。“船坚炮利”顺带摧毁了深深根植于晚清社会封闭、麻木和自满情绪。被敲醒了的国人不得不放心世界，被迫承认我们在当时已远远落后于那些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治理能力展现丰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

史景迁先生用大量的事实、独特视角论证自己的时刻划分，彰显了充分、准确“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重要性。

柯文批判了三种“西方中心观”

- 第一种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论”(impact-response model)，该理论认为晚清以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的面向是西方人的入侵。
- 第二种是以列文森(Joseph 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现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一切社会的模板，中国近代史也必将以西为楷模。该模式认为中国在西方入侵之前是一个停滞的帝国，朝代不断更迭，但实质的进步却微乎其微。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现代化格格不入，成为现代化的阻碍。只有被西方人打败后，中国才终于开始沿着西方走过的路，逐渐现代化。
- 第三种则是帝国主义模式(imperialism model)，指认帝国主义才是中国近代史上各种灾难的主因，近百年中国所遭遇的各种不幸，祸根都在帝国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三个阶段：

1

二战之前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决定论，强调不同种族之间的反差，并据此为西方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背书”的话。

2

冷战时期则体现为一种制度决定论，强调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之间的对垒。

3

后冷战和全球化时代，文明决定论大行其道，西方主导的“文明”世界与“非文明”势力之间的双向对抗。



欧洲中心论 视角下的 “民族国家”

- 01 白种人的西方尤其是英国和西欧国家属于头等“文明”（civilized）世界，组成了边界分明的主权国家，代表了进步，在这里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并具有理性精神；
- 02 黄种人的亚洲各国处于专制政权之下，人民缺乏理性，国家没有疆界和主权，或者在其他帝国的间接统治之下，属于次等的“野蛮”（barbaric）世界；
- 03 黑种人的非洲土著只有部落组织，没有政府，没有进步，处于时间凝固状态，属于最底层的“蛮荒”（savage）世界。

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民族国家”

- ◎ 欧美国家走过的路和代表的进步方向，适用于一切非西方国家——此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
- ◎ 按照这种理论，世界各国，无论是欧美的“先来者”，还是亚非拉的“后来者”，迟早都会经历从糊口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到科技密集的工业化经济、从威权主义统治到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政治、从受宗教支配的价值观到科学理性的世俗主义的“现代化”转变，
- ◎ 而现代化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只有在建立民族国家后，才有可能实现经济起飞，政治参与扩大和社会整合才有可能。
- ◎ 这种理论之所以是欧洲中心论的改头换面，因为它把战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所流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视为世界其他国家都应该效仿的样板。
- ◎ 事实上，现代化理论不仅是一种对社会科学各个领域影响至深的学术表述，更是服务于美国在冷战期间在全球范围与社会主义阵营对抗、争夺对第三世界新兴国家影响力的一种意识形态。

正确地认识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

1

一方面，抛开制约人们认知过程的固有逻辑，回到历史之中真正认识事实的真相；

2

另一方面，要了解这套固有逻辑本身是如何被建构的，又是如何用来建构历史的。

3

只有回到历史过程之中，掌握真相，我们才能解构被既往的逻辑所建构的历史，并把自己从固有逻辑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正确地认识 现代中国的 国家形成

01

基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民族国家形成路径，远非普遍适用于世界各国历史的认知范式，尤其不能简单适用于数世纪以来现代中国的形成过程。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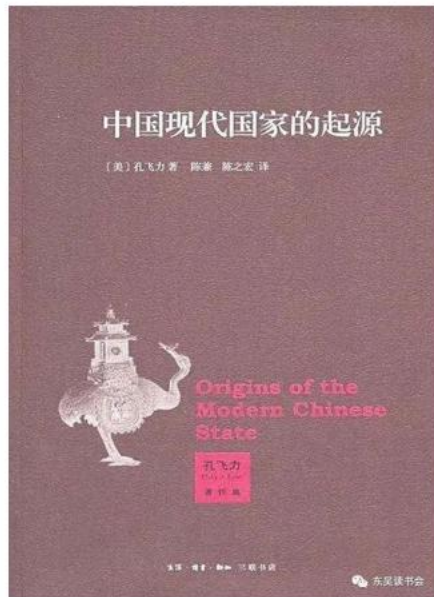
现代中国规模之“大”，既有清朝以前的历史和人口作基础，也是清朝国家对边疆的整合和有效治理的结果。

03

而现代中国结构之“强”，是18世纪以来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关系辩证运动的历史产物，其产生路径迥异于西方所谓“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过程。

孔飞力：“中国变革由**内部**动力主导”

- 作者主要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将中国现代国家形成及发展的“根本性议程”归结为三组相互关联问题或矛盾：
 - 第一，政治参与的扩展与国家权力及其合法性的加强之间的矛盾；
 - 第二，政治竞争的展开与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加强之间的矛盾；
 - 第三，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同地方社会财政需求之间的矛盾。
- 事实上，“不同国家是可以经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作者认为：“从本质上来看，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却是由其**内部**的历史演变所决定的。”



“

“西方中心论”与“中国中心论”

- 近代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立场观点的对垒，反而有可能形成研究领域的趋同。
- “中国中心论”的意义在于通过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非只是对近代以来外来刺激的反应，而是基于自身的独特经验，是中国内部历史叙事的逻辑结果和自然指向。
- 以前，我们总是以为中国近代学术受西学牵动，亦步亦趋。到今天我们应该反思，是否忽略了近代学术中西互动的层面？

“

现代国家有四个构成要素：领土、
人口、政府、主权。

然而，绝大部分的历史书，都是聚焦于政府视角，并串联其他要素，以“宪治”或“现代化”作为衡量尺度。

”



把从满清到晚清、从晚清到民国，再到1949不同的政权变革，置于由族群、疆域、主权等共同构成的“现代中国的形成”这一宏大历史视野中加以理解。



思考

- 同为疆域辽阔的帝国，为何“西亚病夫”的奥斯曼帝国历经6个世纪的经营，但遭遇一场战争后便分崩离析，而被讥讽为“东亚病夫”的中华帝国，从1600年开始，虽遭遇无数场内外战争，却屹立不倒？
- 在传统的认知中，满清是中国历史上异族统治时间最长的专制、腐朽王朝，晚清更是丧权辱国的存在，然而，无法忽略的事实是：满清的地缘战略，以及囊入版图的疆域面积，被全部继承。如何评估满清的历史遗产，是如何理解现代中国始终无法绕开的命题。
- 从1600到1949，一方面社会制度转型频频受挫，但另一方面，政权更替频仍，但却都相对成功地化解了地缘疆域危机、财政困局和政治认同等关键问题。这一成一败，既塑造了现代之中国，却也构成了“中国特殊性”这一绕不开的事实判断。我们对现实以及未来的洞察力，与是否承认，以及如何理解这一“特殊性”直接相关。

第一章 导论/1

问题所在/1

地缘、财政、认同:一个分析架构/13

若干关键论题/20

第二章 早期近代疆域国家的形成:清朝前期和中期的中国/42

边疆的整合/44

治理边疆/55

治理内地各省/62

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76

第三章 边疆整合的限度:清朝财政构造中的低度均衡机制/88

清代的战争与财政/90

清朝财政的低水平均衡/102

清朝在世界历史上的独特性/112

第四章 地方化集中主义:晚清国家的韧性与脆性/127

财权区域化/130

有条件忠诚之滥觞/145

地方化集中主义/157

第五章 从内陆到沿海:晚清地缘战略的重新定向/160

传统地缘秩序之终结/161

塞防与海防/164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成与败/169

第六章 迈向现代民族国家:清末新政时期的国家重建/187

财政构造中的高度非均衡机制/189

地方化集中主义的陷阱/197

缔造新的民族/206

第七章 集中化地方主义:民国前期财政军事政权之勃兴/220

军阀竞争中的赢家与输家/223

为何国民党势力胜出?/242

走向国家统一/252

比较分析: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259

第八章 半集中主义的宿命:国民党国家的成长与顿挫/265

制造新的正统/269

党国之政治认同/279

国民党国家的半集中主义/292

第九章 国家建造的全面集中主义路径:一系列历史性突破之交汇/299

共产党革命的地缘政治/304

打造政治认同/310

东北地区与国共内战/320

共产党根据地的财政构造/327

一个比较分析/338

第十章 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国家转型/350

疆域的扩张与整合/351

王朝的衰落与调适/358

迈向民主抑或高度集权/364

第十一章 历史地认识现代中国/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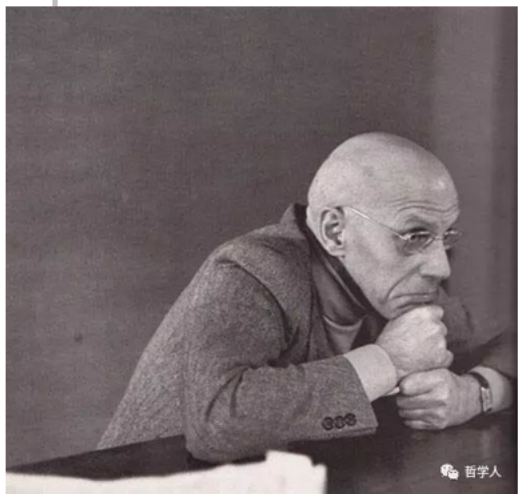
“民族国家”的迷思/369

现代中国之成为“问题”/372

中国为何如此之“大”? /376

中国为何如此之“强”?/379

国家转型的连续性/384



”

“权利与知识彼此涵摄，互辅互成，缺一不可”

“以权力为中心的知识是高度地政治化的。”

——福柯

呈现四大特色：

01

一是紧紧围绕现代国家形成的要素——疆域（领土、边疆）、人口（族群）、政府（国家治理能力）、主权展开论述；

02

二是重点选取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等关键变项进行精细而恰当的探讨，并追究诸类项之间的关系和交互影响；

03

三是打破社会形态界限，将近三百年的中国国家——社会转型作为一个继承、变革、贯通的完整过程；

04

四是将近世中国的国家——社会转型置于世界全史的视域下加以认识和照察。作者所论，非同类著作所可比肩。

在研究路径：立足中国自身的经验，以理解中国的历史轨迹。

要正确理解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过程，必须摆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存在的因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所造成的种种偏颇和臆测，在世界历史的视野下探寻中国的独特路径。

帝国

王朝国家

天下国家

- 一. “帝国”应该区别于西方政治话语所使用的“帝国”这一概念。
- 二. “王朝国家”比较符合历史实际。
- 三. “疆域国家”所强调的是清朝有固定的疆域，尤其是在18世纪中叶之后，跟周边国家之间有条约所界定的或习惯性的分界，总体上保持疆域稳定。



建造现代中国： 三个关键环节

01

汉人与其他族群的关系，这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中国的疆域构成和治理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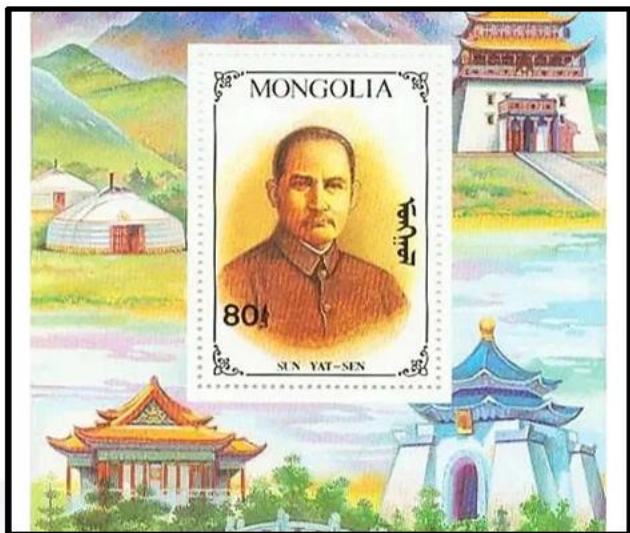
02

中国和外国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优先项；

03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它决定了中国国家的权力架构及其应对国内外挑战的能力。

中国的国家建造的历史经验，从两个方面“偏离”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正常”路径：



其一，它并没有经历多族群帝国的崩溃、分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系列各自独立的民族国家，相反，至20世纪中叶，在中国所出现的是一个就领土格局而言，跟清朝在极盛时期的疆域大体相当的国家；现代中国因此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建立在旧日“帝国”疆域之上的民族国家。

其二，它并没有建立一个西式的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代议制民主制度，最终产生的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其生命力之强，乃至在建国后近七十年间维持其政党—国家的体制基本不变。这在21世纪的世界诸大国中，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现代国家” 首先是一个 主权国家

现代国家的主权含有两个层次：

- 一是国家主权，即本国的疆域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和承认；
- 二是人民主权，用国内的政治语言讲是人民当家做主，在西方政治话语中强调的是代议制民主。
- 具体到国家的构成要素，李怀印教授强调政权、土地、人民、主权这四个方面的要素，认为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最主要的区别是在于其主权属性。
- 就中国的形成历史来讲，前三个要素在历朝历代都有，但是主权这个属性是在19世纪以后才获得的。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具有“既大且强”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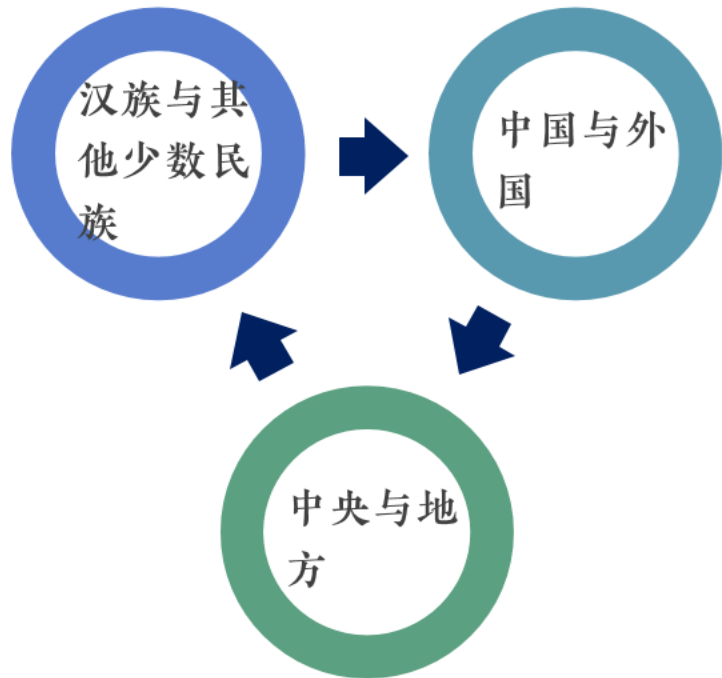
一、“大”指的是它的体量。中国的地理面积、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在全世界相当长时间内曾经独占鳌头。

二、“强”指的是权力结构的强固，即高度的集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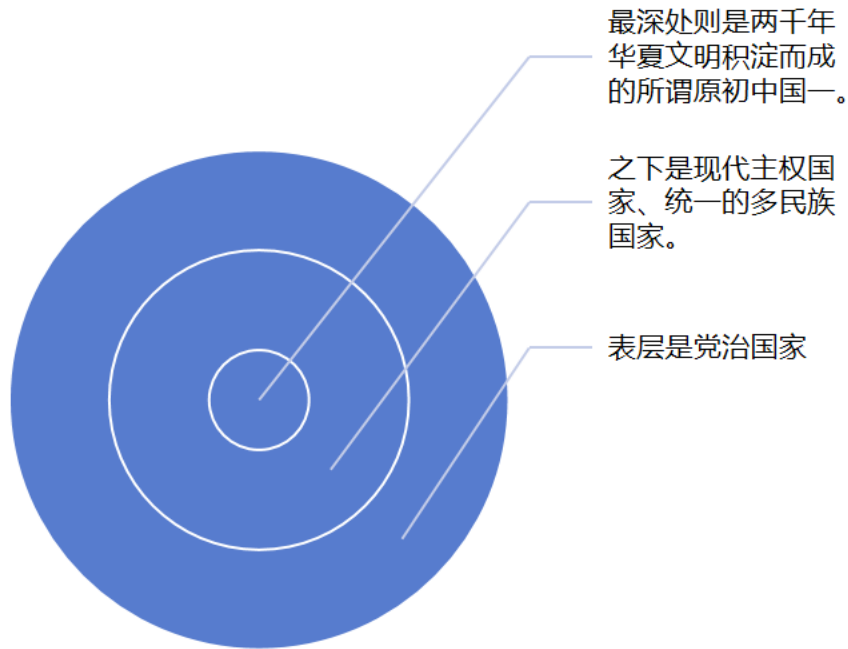
三、二十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最突出特征，是“大”与“强”两者兼而有之。

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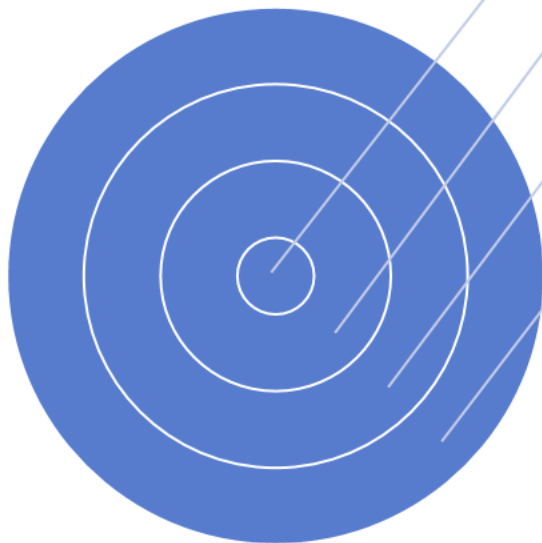
从原初的族群国家到疆域国家到主权国家再到高度集权的现代国家



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叠加的过程



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形成有四个层次



最深处则是两千年
华夏文明积淀而成
的所谓原初中国。

成型于1750年代的
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以及清朝以前的，

成型于1945年的现
代主权国家

成型于1949年的共产党所领导
的社会主义国家

- 在其新近的表层，中国呈现为一个党治国家，亦即共产党领导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它是共产党革命尤其是1946-1949年内战的直接结果。
- 在此表层之下的第二个层次，中国呈现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法下与所有其他国家一律平等，并且对于其官方地图所显示的边界之内的所有土地和水域拥有排他的主权。它的出现，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被逐步纳入世界范围的主权国家体系的结果，并且以丧失部分领土和主权为其代价，而国民党国家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建国努力，对于界定现代中国的主权范围起到最关键的作用。
- 在第三个层面，中国还把自己表述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在行政划分上包含23个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份，4个直辖市，以及5个少数民族集中居住的自治区、2个特别行政区。这一行政的和人口的区域划分，源自清朝至1750年代为止的军事征讨和疆域整合，同时也离不开此后一个半世纪清廷对边疆的用心治理。
- 而处在国家历史建构最底层的，则是华夏族群在其赖以生息繁衍的土地上所形成的原初“中国”及其所孕育的延绵不断的文明；它为现代中国人民形塑民族认同、建造现代国家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和丰沛的文化资源。

01

中国的国家转型，并不是帝国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断裂，而是上述四个层次由底部到表层不断叠加的结果；

02

每增添一层，中国的国家形态即会有新的变化，被赋予新的含义；

03

现代中国孕育于古老的华夏文明，但更是清代以来国家转型的结果。



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

- 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显示了一个与既往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所形成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认识范式完全不同的路径。
- 中国的国家形成路径是最接近于近代主权国家的早期近代疆域国家为起点，依靠这个疆域国家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行政、财政和文化资源，缓慢、艰难但是稳步地朝着近代主权国家的方向演进，并且最终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主权完整、政治统一、高度集权的阶段性目标。
- 归根到底，是由中国的不断变化的**地缘格局**和自身的各种**财政、军事和政治资源**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原动力。

01

中国的建国力量，从晚清的改良和立宪派，到民初的革命党人，以及20年代以后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都曾一度倾心于欧美、日本或苏俄的各种建国模式。

02

但是中国的体量太大，历史惯性太强，使那些移植自国外的任何理念和模式，最终不得不让位于植根于中国自身传统和资源的内在动力和逻辑。

“

地缘、财政、认同三个要素

- 在研究方法上，这本书主要侧重地缘、财政、认同三个要素，从这些因素消长的过程，亦即均衡与非均衡相互交替的变化过程中，把握国家转型的机制和动力。
- 所谓“均衡”，是指不同的要素、力量相互作用，相互抵消，形成一种均态，它所呈现的是累积性的、渐进的、量变的态势；
- 所谓“非均衡”正好相反，往往带来颠覆性的或突破性的变化。

”

在地缘格局上，清朝从非均衡走向均衡

- 到了18世纪50年代，内地的18省与周边的各个边疆，从东北的满洲，北部的内外蒙古，西部的新疆，西南部的西藏，连成一片，不再留有任何缺口，边患基本上不复存在。周边再无内侵的威胁，清朝也失去外扩的动力，因此在中国与周边之间形成了一种大体稳定的均态。
- 所以清朝的军事装备从此基本上处在一种停滞状态，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与同时期的西方相比，越来越落后。

在政治认同上，如何通过制度化的安排，形成核心的组织力量体系，实现主权国家的对外主权和对内治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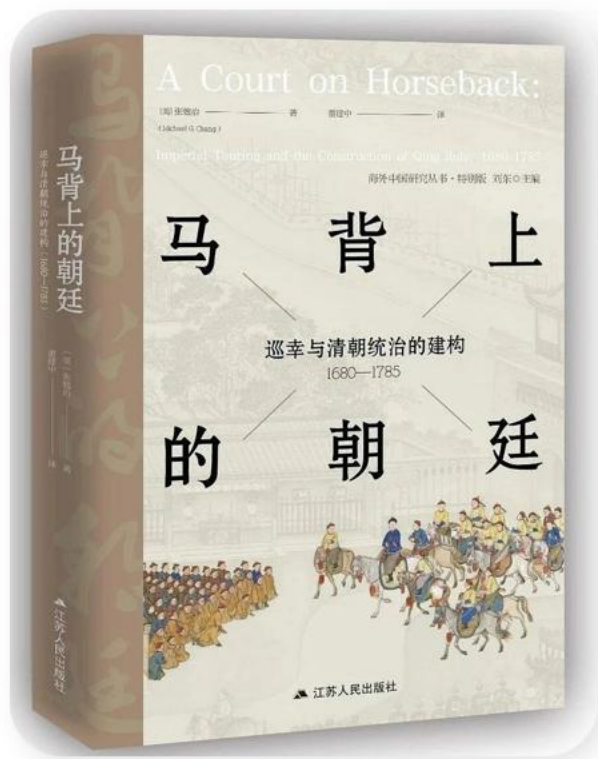
在财政方面，财政是否统一，税收是否巩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能力。

清朝前期疆域国家形成是在**地缘、财政、认同**这三个要素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中展开的，这样一种均衡态推动了疆域国家的形成，支撑了清朝盛世，但同时也阻碍了清朝国家能力的提升。

“

“乾隆皇帝不仅想向非汉族的部落首领炫耀江南的繁华，而且也向他的南方臣民展现他在内亚军事统治的切实证据。皇帝所编排的内亚人士和汉族精英在长江下游地区的见面，意在提醒对方，他们只是一个幅员更为辽阔、多民族帝国的一部分，这一帝国不是任一特定疆域所构成，而是由一个移动满洲朝廷的军事力量 and 美德所建立。

”



在财政构造上，清朝前期也在走向一种均衡。

- 清朝前期中央的财政收入在4000万两-4300万两之间，开支在3200万两-3600万两左右。
- 在供给侧，田赋收入基本稳定，
- 在需求侧，没有额外开销、内地治理成本比较低。
- 但这种财政结构的弊端是没有弹性。
- 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田赋，比较固定，没有扩张能力，
- 区别于同时代税收随着工商业发展而增加的西方财政国家。

在政治认同上，清朝前期也在从不均衡走向一种均衡。

- 满人入关之后，面临汉人的抵抗、不合作，满汉关系一度紧绷。但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软硬兼施，一直在不断地弥合满汉之间的分歧，赢得汉人士绅的忠心。在18世纪末白莲教起义之前，内地基本上没有大规模民乱，边疆地区也没有出现分离的势头，总体上处在均衡和稳定的态势，与同时代西方的革命和战争高潮迭起形成了鲜明对比。

均衡：支撑了清朝的盛世，也构成了一种陷阱

- 首先，两次鸦片战争导致清朝的地缘格局完全发生转变，从原先主要处理内地与边疆的关系，变成处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挑战。
- 财政格局也发生一种颠覆。人口暴增，加上白银外流，导致银贵钱贱，影响到百姓的纳税能力；再加上太平天国控制了清朝财源最主要的渠道，即南方地区，最终导致咸丰年间中央银库库存骤减到最低程度。
- 在政治认同上，最主要的挑战来自以反满为号召的太平天国，同时清朝的权力关系也失去了以往的均态，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清贵族向汉人官僚转移。



展望未来，中国的国家转型面临的挑战：

- 一是通过内地与边疆之间的经济整合，通过重构原先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历史书写，在相互尊重各自文化遗产和特性的基础上，在汉族和非汉族人群之间培育共享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
- 二是重塑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从建国时代和国家工业化时期以集中化的权力结构为手段、以民族主权和国家安全为最高目标，过渡到这些目标完成之后，进而以人民的基本权利和福祉为立法和决策的优先考量。这两项任务，对于建构一个和谐稳定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不可或缺。
- 三是重新界定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积极参与或主动建构区域整合和全球治理机制，以造福于所有参与国；同时依靠自身的文化吸引力、知识创造力、政治活力和对全人类福祉的承诺，打造其在世界上的软实力，消减革命时代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所塑就的国民中间过分严重的受害者心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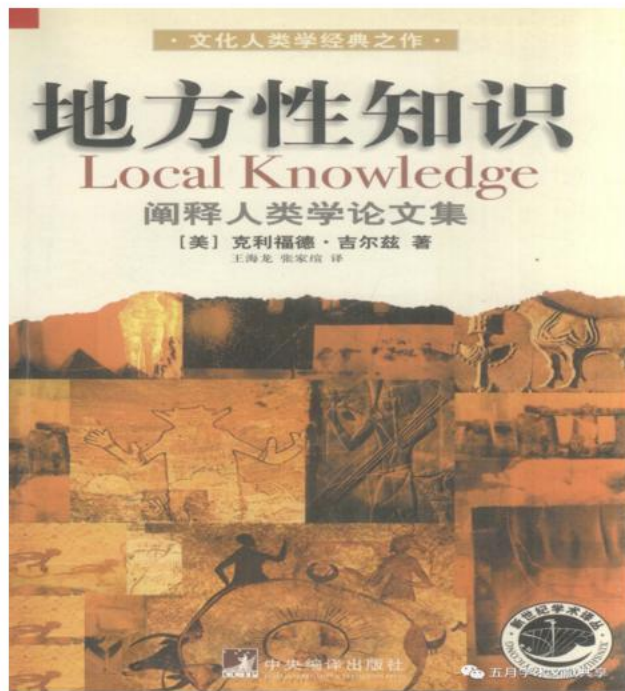
只有在今后数十年内成功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受世人景仰的现代国家和一个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以及整部中国“近现代史”，才能画上完美的句号。

本书的重要性首先在于，作者致力超越以往的革命和现代化主导叙事，去重新勾勒中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历史；其次在于作者将地缘战略、财政构造和政治认同这三个要素形成分析架构，以此解释这个转型过程的发生。这三个要素之所以重要，是由于近年来多学科学者对包括边疆民族研究在内的区域及跨区域研究、明清财政史研究和政治文化意义上的认同研究取得长足推进，故而使诸多微观研究得以升华为本书这样的宏观考量。

——赵世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用别人的眼光看我们自己可启悟很多瞠目的事实。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

——吉尔兹



- 文明的衰弱或者崛起不仅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似乎蕴含着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密码。这不仅仅是象牙塔中的问题，更应该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国人对世界和自己了解的一条重要线索。
- 熟悉并准确把握西方历史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描绘有助于我们掌握“西方视野中的我们”，做到知己知彼。
-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实现我们对自己的准确定位。

“

不读书的人，思想
就会停止。

——狄罗德

